

零工经济下农民工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陶 冉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 农民工作为我国重要就业群体,其就业质量提升对稳就业、促民生及实现共同富裕意义深远。在零工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职业流动呈现新态势,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职业流动却存在降低其就业质量的风险。研究表明,行业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社会网络及职业晋升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主要影响路径。对此,本文立足产业与区域发展需求及农民工群体特征,结合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零工经济;农民工;职业流动;就业质量

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灵活就业成为解决农民工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零工经济,通过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职业流动的机会,降低了失业率。然而,就业率提升并不代表就业质量提升。从就业数量层面来看,农民工在这一流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增量”的同时,能否对其就业质量起到相应的“提质”作用呢?相较于城镇籍劳动力,农民工受限于数字鸿沟、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双重“户籍墙”,其岗位与技能的适配程度大多不高,就业质量普遍偏低。而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同时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带来了契机和挑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渗透融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层面改变了劳动生产方式,推动着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关系和协作模式步入新阶段。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形态和新产业,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扩大了农民工就业创业选择空间。这些岗位不受传统工作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进行选择。通过参与零工经济,农民工能够快速进入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且作为创新发展的有力支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加速构建能够提高信息传输效率,缓解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就业岗位信息和教育资源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普及,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使其就业岗位与技能的匹配概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零工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数字技能较为缺乏的农民工造成了较大挑战,使其就业质量可能出现下行现象。同时,由于专用人力资本的不可转移

性特征,流动者的专用人力资本会随着职业转换而贬值或丧失,进而对职业发展和劳动收入带来损失(Parsons, 1972)^[1]。而且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零工经济带来的灵活用工就业模式存在平台弱化从属劳动关系的风险。因而,关于零工经济下跨产业职业流动是否会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有待理论与实证层面的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 零工经济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

当前,学术界针对零工经济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主要涵盖跨区域流动与跨产业流动两个维度。

空间分布上,中国零工经济呈现东西部发展失衡的态势,新九大都市圈发展迅猛,而西部仅部分特色城镇显现发展苗头,且城市等级越高,零工需求越旺盛(胡雯, 2024)^[2]。另一方面,零工经济平台凭借高效精准的匹配能力,保障了市场运行效率,不过这一优势的发挥依赖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张传勇和蔡琪梦, 2021)^[3]。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大城市具备更高的劳动力与岗位匹配效率,加之农民工求职常受信息不畅与搜寻成本高的制约,使得大城市对农民工形成强大吸引力(Fan and Salas Garcia, 2018)^[4]。

在产业维度,科技进步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零工经济,虽为低技能农民工带来新的就业契机,但科技革新引发的生产模式变革,致使制造业、建筑业等农民工密集就业领域的中低技能岗位被智能机器逐步替代(Lordan and Neumark, 2018),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与转行压力(戚聿东等, 2020)^{[5][6]}。而零工经济在服务业创

造的外卖配送、快递物流等灵活就业岗位，因准入门槛低、适应周期短、工作弹性大，与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需求高度契合（Rodrik，2018），成为其转行再就业的主要方向^[7]。

（二）零工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零工经济对农民工就业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备受学界与公众瞩目，然而针对零工经济下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研究与评估却相对匮乏。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多维度概念，就业质量的研究已从单一变量逐步向多维变量演进。

在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中，收入水平作为核心表征（杨超和张征宇，2022），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8]。但零工经济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存在分歧：一方面，其提供灵活就业选项与多元收入渠道，延长劳动供给时长，产生显著工资溢价效应（王宁和胡乐明，2022），助力劳动者获取稳定高收入^[9]；另一方面，智能机器替代中低技能岗位，迫使农民工流入低技能服务业，导致工资水平下滑（Rodrik，2018）^[7]。尤其我国农民工技能普遍偏低，集中于易被机器替代的制造业、建筑业，虽个体收入或有提升，却不利于家庭随迁与群体增收（李天成等，2022）^[10]。

工作稳定性方面，学界观点不一。王子敏（2019）基于技能偏向型视角，证实互联网使用可增强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11]；李敏等（2020）通过就业弹性测算，肯定零工经济在就业保障上的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期间更为凸显^[12]。但韩文龙等（2020）指出，平台零工经济等数字劳动模式加剧了就业不稳定性，这也是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关键差异^[13]。

工作满意度层面，多数学者认为零工经济有助于提升满意度。Fulvio等（2019）基于多维度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可改善工作满意度^[14]；邓忠奇等（2021）指出新兴职业从业者满意度较高^[15]；夏炎等（2018）与毛宇飞等（2019）认为零工经济能改善工作环境、缩短工时、提高报酬^{[16][17]}。不过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界限，增加工作强度，反而降低就业质量。

也有少量学者从就业质量综合指标展开研究。但只是从数字经济出发讨论数字零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如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与促进机会公平两个独特机制验证^[18]；彭丽娜等（2023）通过同乡聚集与密集劳动力市场两个重要途径考察^[19]。

二、影响路径

本文认为零工经济下农民工职业流动长远来看会降低其就业质量。

在行业专用人力资本积累维度，传统零工所在的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技术壁垒较高，农民工可凭借长期实践积累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中的外卖配送、网约车司机、快递投递等零工岗位，因进入门槛较低且工作内容重复性强、技术含量低，难以支撑农民工进行深层次的人力资本积累。更为严峻的是，这类岗位面临着人工智能替代的高风险，这无疑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长期稳定提升形成阻碍。

社会网络层面的差异同样显著。在传统零工行业，农民工群体依托紧密的线下社会网络，能够在信息共享、技能传承、情感交流及职业推荐等方面获得有力支持，为职业流动与就业质量提升筑牢基础。反观新业态零工，其依赖的线上社交网络在资源整合与情感联结方面存在天然短板，难以满足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多元需求，致使农民工在职业转换后，就业质量提升面临瓶颈。

职业晋升路径的变化也是关键因素。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具备清晰的职业晋升体系，激励着农民工通过能力提升实现职业进阶，进而带动就业质量的改善。然而，当农民工向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零工岗位流动时，由于新领域的职业晋升空间有限，且晋升标准与传统行业大相径庭，使得农民工原有的职业晋升优势难以延续，最终导致就业质量下滑。

三、政策建议

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政府需联合职业院校与企业，构建针对农民工的“订单式”技能培训体系。针对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农民工，着重强化其技术专精能力，推动向技术型产业工人转型；对从事新兴零工行业的农民工，开展数字技能、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课程培训，提升其职业竞争力与抗替代性。同时，完善农民工继续教育补贴政策，鼓励其主动参与技能学习，助力实现人力资本增值。

优化社会网络层面，政府可搭建区域性农民工线下交流服务平台，定期组织职业技能分享会、行业信息交流会，促进农民工之间的经验传递与情感联结。在数字领域，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完善农民工线上社交功能，开发技能共享、职业推荐等社群模块，弥补线上社交网络资源整合不足的短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社会网络支持体系。

关于职业晋升，企业应借鉴传统行业经验，为零工岗位制定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与标准，设置从基础岗位

到管理岗位、技术专家的晋升通道，并配套相应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则需加强监管，推动企业落实职业晋升制度，保障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权益。此外，鼓励企业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跨企业、跨行业的职业能力认证体系，增强农民工职业晋升的通用性与认可度。

在政策支持上，建议进一步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加大对吸纳农民工就业企业的税收优惠、社保补贴力度。完善跨区域就业服务政策，打破户籍壁垒，推动社保、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农民工跨区域流动的后顾之忧。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降低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成本，促进区域就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Parsons D O.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quit rates and layoff rat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2, 80(6): 1120-1143.

[2]胡雯.零工经济下农民工灵活就业研究进展[J].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05): 53-62.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4.05.006.

[3]张传勇, 蔡琪梦.中国城市职业多样性: 事实、演进与政策含义[J].学术月刊, 2021, 53(8): 45-58.

[4]Fan Q, Salas Garcia V B. Information access and smallholder farmers'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Peru[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8, 69(2): 476-494.

[5]Lordan G, Neumark D. People versus machines: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on automatable jobs[J]. Labour Economics, 2018, 52: 40-53.

[6]戚聿东, 刘翠花, 丁述磊.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J].经济学动态, 2020, 717(11): 17-35.

[7]Rodrik D. An African growth miracle?[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18, 27(1): 10-27.

[8]杨超, 张征宇.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 现状、来源与成因[J].财经研究, 2022, 48(04): 19-33.

[9]王宁, 胡乐明.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2, 38(5): 20-35.

[10]李天成, 孟繁邨, 李世杰, 等.技术进步影响农民工就业和收入了吗——来自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下的微观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 2022(3): 100-116.

[11]王子敏.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J].人口与经济, 2017(02): 107-115.

[12]李敏, 刘采妮, 白争辉, 张春阳.平台经济发展与保就业和稳就业”: 基于就业弹性与劳动过程的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0, 37(07): 84-95

[13]韩文龙, 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J].财经科学, 2020(01): 67-79.

[14]Castellacci F, Viñas-Bardolet C. Internet use and job satisfaction[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0: 141-152.

[15]邓忠奇, 程翔, 张宇.中国新职业发展现状及从业者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双维度微观调查数据[J].经济学动态, 2021(12): 52-71.

[16]夏炎, 王会娟, 张凤, 等.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影响研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8, 33(07): 707-716.

[17]毛宇飞, 曾湘泉, 祝慧琳.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01): 72-85.

[18]张广胜, 王若男.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J].中国农村经济, 2023, 457(01): 58-76.

[19]彭丽娜, 徐家鹏, 姜志德, 等.数字经济对农村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 2023, 29(4): 31-46.